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马克思社会发展 理论新解

Theory of Marxist Social Development:
A New Perspective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著
张秀琴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Library of Marxism Studies, Volume 1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一辑

马克思社会发展 理论新解

Theory of Marxist Social Development:
A New Perspective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著
张秀琴 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美) 布伦纳著; 张秀琴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6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第1辑)

ISBN 978-7-300-21552-5

I. ①马… II. ①布… ②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9935 号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第一辑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

[美] 罗伯特·布伦纳 (Robert Brenner)

张秀琴等译

Makesi Shehui Fazhan Lilun Xinj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26.75 插页 1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2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

编委会名单

主编

庄福龄 罗国杰 靳 诺

委员 (以姓氏拼音排序)

艾四林 陈先达 程恩富

顾海良 顾钰民 郭建宁

韩 震 郝立新 贺耀敏

侯惠勤 鲁克俭 梅荣政

秦 宣 石仲泉 吴易风

张雷声 郑杭生

出版说明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加强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深入推进，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迫切需要我们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研究新情况，分析新矛盾，解决新问题，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时代变迁呼唤理论创新，实践发展推动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者，要想适应时代要求乃至引领思想潮流，就必须始终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为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组织策划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丛书。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论库，该套丛书计划在若干年内集中推出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高端学术著作，通过大批马克思主义研究性著作的出版，回应时代变化提出的新挑战，抓住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推进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促进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我们希望“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库”的出版，能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推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	1
一	一般理论	2
二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8
三	结论	21
第二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起源：对“新斯密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29
一	引论	31
二	亚当·斯密和经济发展的阶级基础	36
三	斯威齐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44
四	沃勒斯坦和现代世界经济	55
五	经济发展和欠发展的阶级结构	69
六	资本主义的起源	78
七	“欠发展的发展”	83
八	结论	90
第三章	财产权及其进程：亚当·斯密错在哪里？	103
一	非历史的唯物主义	103
二	斯密的决定性贡献及其批评	108
三	走向一种关于经济发展的历史理论	111
四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演变	114
五	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	129
六	结论：比较视野下的经济发展模式	146



第四章	世界体系理论与资本主义过渡：历史和理论的视角	155
一	引论	155
二	中世纪的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163
三	现代世界体系	167
四	从历史角度看 16、17 世纪的世界经济	173
第五章	从理论到历史：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185
一	简介：曼恩的后现代启蒙观	185
二	从反整体论到“欧洲奇迹”？	187
三	社会权力网络或社会财产关系？	197
四	结论	218
第六章	欧洲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	228
一	人口论模式	230
二	商业化模式	238
三	阶级冲突和经济发展	241
第七章	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根源	275
一	导论	275
二	人口论模式和阶级关系	278
三	阶级结构、阶级组织以及中世纪欧洲封建主义的发展	285
四	封建危机的后果及其后的发展模式	315
第八章	资产阶级革命和向资本主义过渡	371
一	373
二	377
三	381
四	387
五	392
第九章	1550—1650 年英国商业扩张的社会基础	398
一	399
二	401
三	407
四	411
	译后记	421

第一章 马克思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模式*

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问题，马克思先后提供了两种解释模式。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它们混淆在一起、不加以区分。但它们之间却有着本质性区别，即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种模式出现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 1845—1846)和《哲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1847)中，并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1848)中得到了重要的纲领性呈现。这一解释模式的核心就是自我发展的分工概念。以此为出发点，该模式认为，分工直接代表的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它应市场的扩张而变，并继而决定了社会财产^①和阶级关系。根据该模式的基本描述，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指的是一个发展中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成熟：它发源于旧封建社会内部，并从不断发展的世界贸易中汲取营养。该模式的最终落脚点是资产阶级革命，即认为通过这一革命进程，新兴资产阶级社会打破了旧社会的束缚，从而为其持久的自我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种模式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The Grundrisse*, 1857—

* 本文系将要发表的一篇长文的第一部分。

① 这里说的“财产”即“property”，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相关内容大多翻译成“所有制”（参见下文相关引文内容），本书中则多翻译成“财产”（有时为行文方便也译成“财产权”或“所有制”），鉴于本书作者布伦纳教授所提出的“社会财产关系”理论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的重要性，这里特作说明。——译者注

1858)、《资本论》(*Capital*, 1867—1883)及其他一些晚期著作中,但却从未得到马克思的充分完善。其指导原则是生产方式论,即认为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财产关系系统,该系统形成并建构了社会再生产——尤其是个体家庭的延续和阶级的构成。基于这种生产方式论所提出的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模式,是从具有冲突性的再生产开始的,即一方面是农民生产者阶级直接通过非市场化渠道拥有其自身再生产资料;另一方面则是地主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借助于超经济强制性手段从农民生产者身上榨取剩余以进行其自身再生产。该模式的最终目的旨在解释“所谓的原始积累”,从这一视角来看,后者指的是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财产关系被封建社会本身的行为所打破和改造的系列社会进程。

本文旨在澄清马克思的这两种过渡模式及其影响。我要表明的是,第一种模式源于一种“启蒙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具体说来,它与亚当·斯密《国富论》中所提出的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经典解释非常类似,尽管它也以补充的方式援引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保守的唯物主义史学。由于对斯密式概念的依赖,该模式无法恰当地提出过渡问题,而是在关键时刻以过渡解释过渡,特别是以类资本主义机制和结构的萌芽式存在来解释资本主义本身的出现。其所导致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就是,虽然它似乎把阶级斗争(尤其是资产阶级革命)置于历史转型的关键位置,但却使阶级斗争丧失了任何实际意义。

与此相关,我还要揭示的是,马克思基于其生产方式概念而提出的第二种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过渡模式,这才真正使我们能够以一种空前犀利的方式提出过渡问题。可如此一来,马克思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格外艰巨的现实和历史任务,即封建地主和农民缘何正是在封建式的(作为封建阶级的)自身再生产过程之中导致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封建财产关系的转型。在我看来,要面对这个马克思很少提及且从未解决的难题,就必须深刻理解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和变革中的作用。

一 一般理论

马克思最初关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主要呈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其立足点就是该文献中明确阐述的新历史唯物主义

原理，即一个民族生产生活资料的方式、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也就是说他们的“生存方式”决定了他们是什么样的民族，因此，社会演变的关键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因为这是生活资料的生产（生存方式）不断变革的深层原因，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体现在分工的发展中。“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1]

马克思认为，分工的发展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专门化，即先前在同一个生产单位或部门进行的生产活动被划分到不同的单位或部门。理由是专门化生产效率更高、更多产。最初和最典型的专门化，是工业和农业的分离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在马克思看来，商业与工业的分离，以及复杂的手艺被分解成简单的生产流程，凸显的是分工的进一步发展。^[2]

分工发展的第二个方面涉及单位内部的直接生产组织，因为劳动过程不是以交换和市场为媒介的。这在技术上也是由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3]

最后，正如生产力的发展（借助于同时决定单位和部门的不断专门化以及劳动过程的变革）引起分工的发展一样，分工也通过引起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进一步分离决定了阶级的演变，因此，每一种合作方式都带有其具体的脑—体、知—行分离形式。对于马克思来说，正是这一最具有根本性的分离，决定了阶级和更一般性的财产关系。“各个团体（在合作中）的位置，取决于生产的组织方式”。继而，“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因此，大致说来，父权制产生于所有生产任务都集中在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最初原始生产阶段，而师傅对学徒的统治则产生于行会内部的手工业作坊式生产等。于是就可以理解：“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4]

我们由此发现，在马克思的上述第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构想中，生存方式决定了社会存在的本质，而生产力发展水平则又决定了生存方式。历史的沿革继而所遵循的是一种明显的决定论。生产力水平本身的不断提高，体现在不断发展的分工上，即日益专门化和合作方式的革新（都



可理解为生产的技术性需求反映)。每一种合作方式都决定了一种具体的脑体分工，而生产单位内部的脑体分工则最终决定了整个社会的阶级本质。财产形式仅仅是阶级本质的一种具体表现，因为它是由生产者之间的关系（鉴于他们各自与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不同结合方式）所规定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因果链：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发展（专门化与合作）→脑体分工形式→阶级和财产关系（劳动资料、工具和产品的分配）。

一个初始性难题^[5]

我们或许马上就会发现，这一进程的立足点是一系列的相关假设，即假设：（1）生产力（在技术进步的意义上）一直会发展；（2）新的生产力会被广泛采用；（3）随着新生产力的普遍采纳，阶级—财产结构将发生相应转型。当然，类似的过程的确会在既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中经常发生，但那是因为既定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必然会存在特定的具体条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人能够直接占有其自身的再生产资料，换句话说，没有人拥有足以使其自身生产所有生存必需品的全部或大部分原材料、工具和劳动力，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购买大部分生活必需品，而为了能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他们不仅要有东西可卖，而且还要能“在市场上”把东西实际卖出去。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必须进行交换型生产（因为他们没有生存型生产所需要的资料），还必须能够有“竞争力”地开展生产，因为每个人都在“为交换”而生产。^[6]

在这种既有的资本主义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进程的确会发生。因为一方面，为确保交换型生产的持续性和提高竞争力，每个人都会积极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一种强大的自然选择机制也会确保先进技术的普及，即生产者必须采用最好的技术才能有市场竞争力，否则他们就只能出局。鉴于某些附加但却不无道理的假设，我们可以进一步预见，小个体经营者最终将在竞争中输给使用雇佣劳动的大生产者。资本家将会因其高效率而在与小生产者的竞争斗争中获得成功，所以，生产力不仅会得到发展，而且最先进的生产力还会被引进和推广。最后，这一过程会导致阶级—财产关系的适时转型。^[7]

但假设生产不以交换为目的，也不具有竞争性，尤其是假设生产者拥有开展其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全部或大部分原材料、工具和劳动力，

而且这些再生产资料具有不可剥夺性。换句话说，假设（展望未来）人们获得了再生产资料占有权或财产权，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他们从事与生产资料（如与发动战争的资料相对）有关的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可能会相对降低；其次，他们可能会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实施创新，而且，即使此时他们的对手真的实施了创新，他们也未必会跟进，因为他们不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也就不需要为了生存而参与市场竞争，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用来淘汰那些未能实现“社会必要”率的生产者）的自然选择机制了。在此条件下，生产力也许就不会发展，且即使在一些生产单位中有所发展，先进技术也不会借此全面推广开来。旧的财产结构可能会最终得以实际保存，或者是允许截然不同水平的生产同时并存，甚至是阻止新生产力的广泛采用，因此，是生产力被迫适应财产系统，而非财产系统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并未直面这一难题。但无论如何，他的确（以某种方式）在讨论历史的个体化趋势时至少含蓄地涉及了这一问题。马克思认为，家庭及其“倍数”形式亦即部落是最初的分工形式，在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一直都借此获得生活资料。与家庭一部落式原始分工相对应的阶级和财产关系是父权制和公社所有制。部落作为公社把持着财产权；父亲或长辈作为个体或集体决定家庭或部落中的分工，并不成比例地从中获益。即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从狩猎和采集，经游牧生活直至发展到定居农业阶段，他们的生产力依然表现为家庭一部落制分工以及相应的家长制和公社所有制。第一个完整形态的阶级结构——奴隶制，则源于家长制和部落间的战争。但马克思却强调，表现为家长制和公社所有制的部落集体为宗法式奴隶制提供了持续的必要基础。^[8]

与家庭一部落式分工和立足于公社所有制的奴隶制的首次根本性打破相伴随的是城邦的兴起。城邦的兴起“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不过它继而也完成了一场革命，即交换、部落间和部落内部的专门化、个人私有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等的关联性发展，最终导致了城乡分工。^[9]可关于这一过程的本质，马克思的论述却语焉不详，似乎包含着两种可能性解释。^[10]

根据第一种解释，人口是变革的原动力。^[11]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口密度的增加并继而带来了自然资源压力。其所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是加剧了部落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剥削，特别是奴隶制的发展和奴隶受压迫程度

的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则扩展了部落的领土统治，即战争和征服导致一个部落对其他部落的统治，因此，为应对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资源压力，部落开始对内把资源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统治者手中，对外则把资源从被征服者手中转移到征服者手中。总之，以各种方式加强阶级统治和剥削。

这样的发展肯定已大量发生，但却不能用来解释财产形式和生产力的质的转变。马克思将其与古代城邦的兴起联系在一起，且马克思是否认为它们能导致财产形式的质变尚不确定。因此，一方面，即使我们和马克思一样假设部落首领有可能巩固和加强奴隶制，那也只能是对建立在部落—公社所有制和宗法奴隶制基础上的原有制度的延续。同样，即使我们假设一个部落有可能通过征服而控制另一个部落，那也只是对原有部落形式的一种新组合，而非与其决裂。另一方面，假设出现相反的结果，即奴隶反抗使阶级剥削无法加剧，附近部落的成功防御也使征服失去了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部落仍会通过削减物品向首领的流动，即通过减少阶级分化和剥削来应对不断增加的人口压力。然而，该结果又一次只能是旧结构内部量的调整，而不构成一种变革。

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推动个体化进程的显然是交换以及与之相关的专门化的发展。开启公社或部落所有制解体进程的部落间的物—物交换，并没有太多的冲突。这种原始的交换在每一个参与交易的部落内部都对应一种最初的专门化。继而以外部交换为目的的专门化则带来了划时代的发展，即私有制的出现（并不普遍）——最初表现为动产的形式（交换资料）。而与最初的部落间的专门化的密切结合则首次出现了（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内的）普遍形式的私有制（大概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是为了在部落间进行商品交换）。

上述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造成了立足于交换型生产（也就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的个人私有制的出现。正是这个最初导致私有制产生的进程（以交换为目的的专门化），使基于私有制的生产一开始就依赖于交换和分工。于是就可以理解，沿着这一指向个体化（也就是私有制是交换型生产的基础）的最初突破，接下来就应该是（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交换刺激下的城乡分工的出现，生产与贸易的分离，以及最终财产的集中和劳动力的（局部的）无产化……一种迈向（尽管尚未完全实现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生产的运动。^[12]

于是马克思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概括了由交换和分工所导致的从部落—公社所有制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个体化进程。根据这一概括，公社所有制中没有任何贸易或分工，它是自给自足的。与此相反，私有制一开始就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基于私有制的生产者也就可想而知必须参与交换和竞争了，而交换的深入发展则会导致分工和个体化的进一步加剧，并决定了迈向资本主义的运动趋势。这一过程可图示如下：公社社会→不同社会间的交换和专门化→基于动产和不动产私有制的交换型生产→不断扩大的分工和专门化→(?)资本主义。原始的公社所有制可以说是因贸易和专门化而从外部被瓦解的，它产生了基于分工的私有制，这种私有制又在交换的影响下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但很明显，马克思的个体化进程论仅仅是巧妙地处理了我前面提到的难题。但问题的要害在于解释：为什么在既定的交换型生产，即市场导向型竞争性生产之外，生产力的提高（包括新的专门化）会经常发生，为什么一旦发生了就会被整个经济所普遍采用，为什么它会带来所有制，即财产形式的变化。因此，在由城邦的兴起所导致的突破性进程中，马克思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简单的物—物交换就可以引起专门化，即使如此它又为何会被进一步推广，即普及，尤其是为什么一个部落旨在交换而扩大的专门化（为各种专门市场生产配置劳动力）会引起公社所有制的解体，特别是引起基于交换型生产的个人所有制的出现。

在把离开公社所有制的社会转型描述为一种个体化进程时，马克思采取了三个相关的步骤。这些步骤也是他早期著作中解释所有前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典型做法：首先，他对交换兴起的解释，使人觉得旧模式似乎已经是建立在交换型生产基础之上了。所以在先前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内部，出现了一个专事出口生产的部门，并通过与其他部落间的交换维持生计。其次，他认为交换的出现“催生”原来就有的非个体化的旧所有制结构潜在的个人主义内容，虽然该结构整体上仍保持着非个人主义的形式。因此，部落出口部门内部的生产单位，其出现既以私有制为基础，又依赖于交换。最后，马克思认为交换的持续发展最终把整个旧系统转换成一个完全以个人主义为特征、以交换型生产为基础的系统。在向资本主义前进的道路上，公社社会被商业社会所取代。马克思再度认为是交换型生产和专门化消灭和变革了旧模式，同时也再次把基

于个人私有制的生产特征描述为交换型生产。在其所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都认为交换的出现既是旧模式瓦解的主要原因，也是新模式的典型特征。

非常有趣的是，马克思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13]

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只有世界市场占据了主导地位，即所有生产者都依赖于市场（和彼此），并受单一的竞争性市场所支配时，生产力才能有规律地持续发展，因为只有那时生产才真正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竞争也才能真正普遍化。这无疑是一种夸张的表述，但无论如何要点却很明确，即认为我们在解释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财产形式变革时，不能诉诸交换型生产和市场竞争压力，因为它们的影响恰恰取决于一种跨时代的演变，即资本主义社会财产关系的普遍存在。但可惜的是，马克思在其早期著述中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尤其是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具体解释，并没有切实遵循其本人所提出的这一洞见。

二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

马克思关于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种解释，应被理解为

他早期著作中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种应用，同时也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斯密在《国富论》中已提供的相关解释。比照马克思和斯密的说法，我们可以揭示其本质上的相似性和差异之处，并发现他们的共同问题，尤其是（如下文所示），马克思的个体化发展观与斯密的交换与分工发展观，在看待前资本主义的一般演化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具体演化问题时，几乎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因此，和斯密一样，马克思的解释剥夺了封建社会演变的独特性，将一种十分类似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机制强加给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

作为异常现象的封建主义

马克思把封建主义解释为蛮族入侵欧洲的结果。入侵和征战从根本上破坏了古代社会延续下来的经济系统：首先，对先前高度发达的贸易和工业形式构成了近乎致命的打击。其次，部分保留了散布在帝国各个角落的古代农业，尽管古代社会的乡村居民点分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马克思有句名言：“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地，而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最后，马克思强调，入侵者将其士兵共同体叠加在年长而分散的农民共同体之上，构建了封建主义的基本地主—农奴关系。^[14]

斯密关于封建主义起源的说法与马克思类似。和马克思一样，斯密强调封建主义是在古代经济的废墟上产生的，并且瓦解了先前的交换和分工扩张系统：

当日耳曼和西亚民族蹂躏罗马帝国西部各省，并摧毁当地政府的时候，社会巨变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前后延续了好几个世纪。这些野蛮民族对原住民的烧杀掳掠，阻绝了当地的城乡交易。于是，许多城市十室九空，乡村地区一片荒芜……^[15]

在建立封建制度的过程中，这些入侵使社会退回生存型生产阶段，正如后来的贸易复苏使交换型生产建立并实际瓦解封建制度一样。

斯密认为封建主义是一种人为的中断，即贸易扩张和分工发展的自然演化进程被人为地打断，这样一种看法源自他的整个世界观。和启蒙时代的许多同仁一样，斯密的立足点是历史四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构想，社会进步先后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即狩猎和采集阶段、游牧阶段、定居农业阶段以及最终的商业阶段，它们分别代表的是不同的生存方式。^[16]鉴于斯密认为人类天生倾向于物—物交换，分工随交换和市场



的发展而发展，古代经济已经达到第四阶段或者说是商业阶段，所以他不得不把封建主义视为一种异常现象，一种外力强加下的倒退。在斯密看来，封建主义本质就是破坏商业（商业阶段），一旦商业复兴，封建制度必将灭亡。

马克思的观点与此很相似。和斯密一样（或许就因斯密的缘故），马克思也从生存方式开始，且似乎视斯密的四阶段论为理所当然，尽管他把狩猎和采集、游牧生活和定居农业都压缩成一个单一的原始公社或部落阶段。（如上文所示）马克思继而认为，大中断是与古代社会的贸易、专门化和动产私有制同时出现的，这同样是复制斯密的观点。一旦交换、分工和私有制确立下来，接下来就又是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分化的加剧：城乡分工、商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以及所有权的极化（集中和无产化）。简言之，向一种十分类似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演变。^[17]因此，马克思和斯密一样，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仅仅因为封建主义的闯入就中断了该演变进程继续朝着资本主义方向的进一步发展。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因为（如下文所示）马克思和斯密一样，认为个体化进程主要就是既导致封建主义解体又引导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贸易和分工。对于马克思和斯密来说，封建主义的兴起似乎是一种中断，只有在没有交换的情况下它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有理由认为，斯密的第四（或商业）阶段论似乎是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构架起来的。^[18]斯密经常谈及前商业社会的生存方式中也存在商业，它与游牧业，尤其是农业经济并存且相关。当然，斯密同时也认为商业本身也只是一个阶段。这一双重的商业概念与斯密的整体历史发展观是一致的。因为在斯密看来，商业与前商业社会模式的并存与相关性，会促使前商业社会模式以一种“商业的方式”运作，并以商业社会为导向改变其自身。马克思的论证虽然因排斥任何形式的经济人概念，而似乎少了些相关依据，但他实际上采取的是相似的方式。

与封建主义的决裂

马克思认为，封建主义是通过分工的发展而过渡到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一进程的第一个基本的步骤，是农奴逃离农村来到城镇，由此导致手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分离。在城镇，生产最初是由自营业主组织起来的，但随着生产的发展，旋即出现了成熟的分工。而专门化形式则比较